

任弼时论测量党性的四个主要标志

延安整风前后，任弼时就增强党性问题作了一些重要论述。在《关于增强党性问题的报告大纲》中，提出了测量共产党员党性的四个主要标志，这是对党的理论建设的重大贡献，对于在新形势下增强共产党员的党性修养也具有重要指导意义。

——编者

□ 严国红

1941年7月1日，在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20周年之际，党中央发出了《中央关于增强党性的决定》。任弼时同志挤出时间为《中央关于增强党性的决定》最终稿进行了润色修改，并于1941年10月—12月期间，写下了《关于增强党性问题的报告大纲》，这是一篇对《中央关于增强党性的决定》进行权威性阐释的报告。在这篇经典文献中任弼时认为，“党性是以党员的思想意识、政治观点、言论行动来作标志，来测量的”，他从思想观、利益观、纪律观和群众观等方面明确提出了测量共产党员党性的四个主要标志。

标志一：与一切非马列主义思想和观点作坚决的斗争

首先，共产党员必须与“自己的旧的非无产阶级的意识作斗争，战胜它，克服它，排斥它”。在任弼时看来，只有不断与自己的旧的非无产阶

级的意识作斗争，才能培养出真正的无产阶级觉悟和阶级意识，即共产党员的党性。“共产党是无产阶级的先锋队，无产阶级的利益就是共产党的利益。”作为中国共产党的一员，就必须用无限的忠实性和坚定性为无产阶级利益服务。而且，这种为无产阶级利益服务的精神“完全是出自于觉悟性、自动性和积极性”。一旦这种为无产阶级利益服务的精神受到“任何所谓‘要尽的义务’所驱使，所催迫，所束缚”，那么，党员就会成为“盲从者”，而“盲从者的忠实性和坚定性都是相对的东西”。因此，为了培养出这种为无产阶级利益服务的自觉的阶级觉悟和阶级意识，除了我们的党组织应该负责教育党员外，我们广大党员必须自觉地进行这方面的锻炼。当然，这种斗争“不是一天或者几天之内所能做到的”，而是一个长期的过程，无论党员的社会出身和社会成分如何，只有真正经历了这个过程，“新的无产阶级的意识才能容纳得下，才能站得稳，才能慢慢地变成自己属有的东西”，才能成为一个真正的、忠实的和坚定的共产党员。

其次，“在这样的斗争过程中，应

同时并列而进行的工作就是理解和掌握马列主义，以及党的政策和策略”。在任弼时看来，不掌握马列主义的理论，所谓阶级觉悟、阶级意识也不可能真正培育出来。因此，一方面，必须以“无限的忠实性和坚定性”对待马列主义，它是我们共产主义事业的指导思想，是真理，无论是“学习”、还是“运用”马列主义时都必须有无限的忠实性和坚定性；另一方面，“要灵活地、切乎实际地去运用马列主义”。要用马列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去观察问题、处理问题，要从客观实际出发，“不要变成公式主义者、教条主义者、主观主义者”。同时，要为马列主义革命理论的纯洁性而斗争，要大力反对机会主义、投降主义，要对那污辱和曲解革命理论者进行不可调和的斗争，总之，要与一切非马列主义思想和观点作坚决的斗争。

标志二：个人的利益服从于全党的利益，把党的利益放得高于一切，为党的统一、为党的团结而斗争

在任弼时看来，党员的利益、党员的愿望，应与党的利益和党的愿望融汇在一起，党员利益和全党利益是一致的，除了无产阶级的利益外，共产党员没有自己特殊的利益。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就要始终使个人的利益服从于党的利益，把党的利益放得高于一切。

然而，在我们党内的实际生活中，一些党组织和党员出于某些错误的意图，没有正确处理好人利益与全党利益的关系，将自己的个人利益凌驾于全党利益之上，从而在党内滋

生了“个人主义、英雄主义、无组织状态、独立主义、反集中的分散主义”等等不良倾向，正是因为存在着这些不良倾向，党内产生了“公开的或秘密的反党的派别活动、小组织活动”，从而在很大程度上“破坏党的组织，破坏党的统一、纪律和团结”。如果不适时地制止这些不良倾向，任由它们自由发展下去，那么，这些不良倾向一定会“发展到反革命的道路上去”。因此，增加党性的一个重要途径就是“应当对党内存在的这些错误倾向作斗争，同时也对自身存在的这种错误倾向作斗争”。一方面，要始终“以马列主义的原则指导自己的实际活动”，将党的利益放在高于一切的位置上；另一方面，在与党内错误倾向作坚决斗争的过程中，始终坚持“为党的统一，为党的团结”，而不是为了自己或某个派别或小组织的利益。

标志三：遵守纪律、服从组织

纪律是执行党的路线的保证。在任何时候都要高度重视纪律建设。我们党的基本组织原则要求个人服从组织、少数服从多数、党的下级组织服从上级组织、全党的各个组织和全体党员服从从中央。党的纪律既是自觉的，又有强制性。任弼时一再强调，党内没有特权党员，在党的纪律面前一律平等，任何党员都必须“遵守党的统一的纪律”，“这对于任何一个党员都是毫无例外的”。

在纪律方面，我们党负有三重重要责任：一方面，我们党自身要具有高度的纪律性和组织性，要自觉承担起“纪律性和组织性的代表”的职

责；另一方面，采取种种措施，要求并教育广大的党员必须“遵守党的铁的纪律”；再一方面，必须“教育为革命而斗争的阶级遵守一定的纪律”。只有这样，我们的党才能领导无产阶级的斗争，才能向无数非党的工人和群众灌输斗争中的纪律性和计划性、组织性和坚定性。

任弼时特别强调纪律的“自律性”。在他看来，党的各个组织和每个党员首先自己应该服从纪律、遵守纪律，而“不应该只向群众向别的人要求服从纪律、遵守纪律”。也就是说，我们的党组织和党员首先要做的事情是，自己努力“克服无组织性与散漫性，克服不遵守纪律、不服从组织等不良倾向”。

标志四：与群众建立密切的联系，经常使我们党的威信在群众面前提高起来，使得广大群众信赖我们党

我们党是为无产阶级、为广大劳动群众谋利益的党，是领导广大群众为自身求利益求解放而进行革命斗争的党。“我们的党是已经与群众密切联系起来的党，而且仍然为与广大群众取得密切联系而斗争。”我们党的伟大力量“就在于它与广大群众有密切的联系，就在于它得到广大群众的拥护”。因此，我们的党组织和党员要随时“与群众建立真正的密切的联系”，使得广大群众信赖我们的党，提高我们党在群众面前的威信。

在任弼时看来，脱离群众的党组织将失掉战斗力，脱离群众的党员将减弱自己对党的作用。“哪个党的组织脱离了群众，失掉了群众，那就等于失掉了基础，失掉了斗争力量。哪个党员脱离



1941年，任弼时在延安

了群众，那他对党便减弱了自己的作用。”因此，建立与群众的真正密切的联系就在于党组织和党员努力去加强与每一位群众的联系，运用各种正确的方法，争取联系多一点的群众，增强群众对党的支持和拥护力度，尽最大努力增强党的力量。

在这篇党的建设经典文献中，任弼时还强调，我们的每一个党员要虚心地、诚恳地、切实地检讨自己的言论行动和思想意识。若发现自己尚有某样毛病时，便要毫不迟疑地立刻改正它。要积极与各种不良倾向作坚决斗争，要团结互助，诚恳地提出批评，要把理论与实践、工作与学习联系起来，要克服自满自足、自私自利的观念，从而培养和增强党性。



用典释义

和羹之美，在于合异。

【讲话原文】

“和羹之美，在于合异。”人类文明多样性是世界的基本特征，也是人类进步的源泉。世界上有200多个国家和地区、2500多个民族、多种宗教。不同历史和国情，不同民族和习俗，孕育了不同文明，使世界更加丰富多彩。

——习近平《共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在联合国日内瓦总部的演讲》（2017年1月18日）

【出处】

太傅司马宣王问以时事，玄议以为：“……夫和羹之美，在于合异，上下之益，在能相济，顺从乃安，此琴瑟一声也，荡而除之，则官省事简……”

——（晋）陈寿《三国志·魏书九·夏侯玄传》

【解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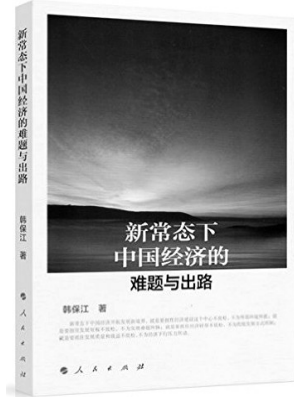
夏侯玄（209—254年），三国时期曹魏官员、玄学家。一次，司

马懿向他询问时事，夏侯玄提出了“审官择人”“除重官”“改服制”等改革建议，司马懿赞之“皆大善”。关于“除重官”，夏侯玄认为：“和羹之美，在于合异；上下之益，在能相济。”意思是说，佳肴美饌，在于能够调和各种不同的味道；良好的上下级关系，在于能够彼此相互学习，取长补短。

“和羹”之喻出自《尚书》。商王武丁对名相傅说（yù）说：“尔惟训于朕志。若作酒醴，尔惟曲蘖；若作和羹，尔惟盐梅。”武丁将治国栋梁傅说比作酿酒酒的酵母、调羹的盐梅。盐咸梅酸，盐梅适当，就成“和羹”。另据《左传·昭公二十年》记载，齐景公曾问晏子：“‘和’与‘同’有什么不一样吗？”晏子答道：“不一样。‘和’就好像做羹汤，用水、火、醋、酱、盐、梅来烹调鱼和肉，味道太淡了就加调料，味道太浓了就加水冲淡，使各种味道恰到好处。”老子《道德经》第六十章中的“治大国，若烹小鲜”，也是以烹鲜调羹与治国相类比。

（杨立新）

好书推荐



《新常态下中国经济的难题与出路》，韩保江著，人民出版社2016年12月出版。

本书基于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经济工作的一系列重要论述，以理论创新为指引，以政策分析为导向，深入浅出地阐释了在新的历史发展阶段，如何化解中国经济面临的矛盾和困难，如何加快适应、把握和引领经济发展新常态，如何制定符合基本国情的政策支撑体系等重大问题。该书着力阐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中的新常态，为引领经济发展新常态、拓展发展新境界提供了可供参考的思路。

《从中国制造到中国创造》，【瑞士】乔治·豪尔·马克斯·冯·泽德维茨著，中信出版社2017年2月出版。

能否顺利从中国制造转型为中国创造，决定着中国的未来，决定着每一个中国企业的命运。“双创”大潮来临，中国的产业、企业、个人将面临哪些机遇与挑战？本书的两位作者在中国执教十余年，对中国创新的发展历程、机遇与不足有着深刻的认识与了解。本书全景式地展现了中国从制造大国转为创新大国的过程中，政府、企业、个人起的不同作用，探讨中国自主创新能力，深入挖掘了从中国制造到中国创造的根本动因。

《了凡四训》：为善善为

□ 凌龙华

《了凡四训》是明朝的袁了凡先生，结合自己亲身经历和毕生学养，为了教育自己的子孙而作的家训。文章篇幅短小，但是寓理深刻，兼融儒释道三家思想和真善美中华文化，通过“立命之学”“改过之法”“积善之方”“谦德之效”四章，论证“种瓜得瓜”“善有善报”“积极进取”“有愿皆成”之理。本为训子书，渐为劝世宝典。数百年历久不衰，时至今日，仍然是脍炙人口、滋养身心的杰作。

知行合一：改过之法

“知是行的主意，行是知的功夫；知是行之始，行是知之成。”这是袁了凡一生行动的准则。《了凡四训》，尤其是“改过之法”，集中体现着知与行的正向交互。

知过为先。“未论行善，先须改过。”“过不论久近，惟以改为贵。”“过”不可怕，可怕的是不知觉。“心”为知之源，因而，“大都吉凶之兆，萌乎心而动乎四体，其过于厚者常获福，过于薄者常近祸”。

改过先改心。“过由心造，亦由心改。”了凡为此开出处方：“第一要发耻心”“第二要发畏心”“第三须发勇心”。这贴“三心”药，与孔子的“知耻近乎勇”，与孟子的“四端”说，一脉相承，特别发人深省。

改过须明理。何以为“过”？了凡声明：“善改过者，未禁其事，先明其理。”

有心有行，改过不难。了凡作如下推导：“具是三心（耻心、畏心、勇心），则有过的改，如春水遇日，何患不消乎？”“但当一心为善，正念现前，邪念自然污染不上。如太阳当空，魍魉潜消。此精一之真传也。”对改过方法则作如下指导：“有从事上改者，有从理上改者，有从心上改者。工夫不同，效验亦异。”“大抵最上治心，当下清静，才动即觉，觉之即无。苟未能然，须明理以遣之。又未能然，须随事以禁之。以上事而兼行下功，未为失策。”事上改，理上改，心上改，循序渐进，或多管齐下，都不失为改过策略，可行并行力，奏效。

为善与善为：积善之方

积善，可谓了凡修身功课，也是其济世、劝世良方。“积善之方”通过正反事例列举，告诫世人“善不积不足以成名，恶不积不足以灭身”；同时进一步剖析“为善当善为”。

了凡的学说之所以深入人心，在于“劝”（倡导）与“说”（析理）辩证结合。好心不做好事，结果适得其反，问题就出在稀里糊涂，不辨“真假、端曲、阴阳、是非、偏正、半满、大小、难易”。由此，了凡强调：“为善而不穷理，则自谓行持，岂知造孽，枉费苦心，无益也。”这样的清醒，难能可贵。

选摘数条佐证——

关于真假。“是故人之行善，利人者公，公则为真；利己者私，私则为假。又根心者真，表迹者假。又无为而为者真，有为而为者假。”为善不可“伪”也。

关于是非。“人之为善，不论现行而论流弊，不论一时而论久远，不论一身而论天下。现行虽善，其流足以害人，则似善而实非也。现行虽不善，而其流足以济人，则非善而实是也。”为善不在形式而在“实质正义”。

关于丰满。“前者物虽薄，而施心甚真”，“今物虽厚，而施心不若前日之切”，故“此千金为半，而二文为满也”。

患不在大，要义在“舍”，“内以破吾之慳，外以济人之急”。于此，了凡苦口婆心，再次为“积善之方”开示良方：“所谓布施者，只是舍之一字耳。达者内舍六根，外舍六尘，一切所有无不舍者。”何谓舍得？舍而有得（德）也。

了凡一生，善事不计其数。为宝坻全县百姓请命减赋一事，便功德无量，“善心真切，一行可当万善”。他所设计的“功过格”，简便易行，为纯化社会风气起到了莫大的“教具”功用，深受推崇。《袁了凡传》云：“了凡既既百有余年，而功过格盛传于世。世之欲善者，虑无不知效法了凡。”当然，那仅是学点皮毛，为善根本还得从心做起。



袁了凡

命由我作、福自己求：立命之学、谦德之效

了凡不凡。不凡在其守凡不要为，又超凡脱俗大有作为。

37岁遇云谷禅师前，袁了凡完全被锁定在家乡孔老先生算定的“命数”中。迷信“进退有命，迟速有时”，因而，“澹然无求”，“原来只是凡夫”。

醍醐灌顶，一句“命由我作，福自己求”让袁了凡人生积极反转。“立命之学”一章，作者大量引述云谷禅师当年教诲，借禅师之口指点人生，传授真谛。

“务要积德，务要包荒（包容），务要和爱，务要惜精神。”“从前种种，譬如昨日死；从后种种，譬如今日生。”作者由是“知非”，人生从此“痛刷”一新。这段经历，对作者是一次涅槃，对读者是思想洗礼。晚清曾国藩受此影响而更名号为“涤生”。

铭心感悟，记录于兹：“余初号学海，是日改号为凡。盖悟立命之说，而不欲落凡夫窠臼也。从此而后，终日兢兢，便觉与前不同。前日只是悠悠放任，到此自有战兢惕厉畏心。在暗室屋漏中常恐得罪天地鬼神，遇人憎我毁我，自能恬然容受。”

简直脱胎换骨，无疑开创新天地。于是，自勉自律，善行三千，又三千，又“一万”（心愿修得“合县减

粮，万民受福”）。求福为己，行善利人，何乐而不为？

“远思扬祖宗之德，近思盖父母之愆；上思报国之恩，下思造家之福；外思济人之急，内思困（防御）己之邪。”“务要日日知非，日日改过。一日不知非，即一日安于自是。一日无过可改，即一日无步可进。”最后，了凡以切身体验告诫世人：“天下聪明俊秀不少，所以德不加修、业不加广者，只为因循二字耽搁一生。”立命之学，泣血相告。

“满招损，谦受益。”“谦德之效”一章，多引述前贤教导，同时也从亲闻亲见亲历中提炼出亲身感受：“每见寒士将达，必有一段谦光可掬。”谦为美德，因而必须懂得敬畏：“举头三尺，决有神明。趋吉避凶，断然由我。”谦亦为善行，因而需要砥砺前行：“人之有志，如树之有根。立定此志，须念念谦虚，尘尘方便（佛教语，意为给人无微不至的帮助），自然感动天地，而造福由我。”

国学是民族精神宝库，珍视宝库，就要“取其精华，去其糟粕”。《了凡四训》中的“善论”，促人警醒，催人奋进，但其不免牵强的命运说与唯心的善恶因果论，则需甄别批判。辩证“舍得”，智慧“扬弃”，何尝不是读国学经典的“为善善为”？